

陕西通志

「明」赵廷瑞 修

马理 吕枬 纂

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总校点 董健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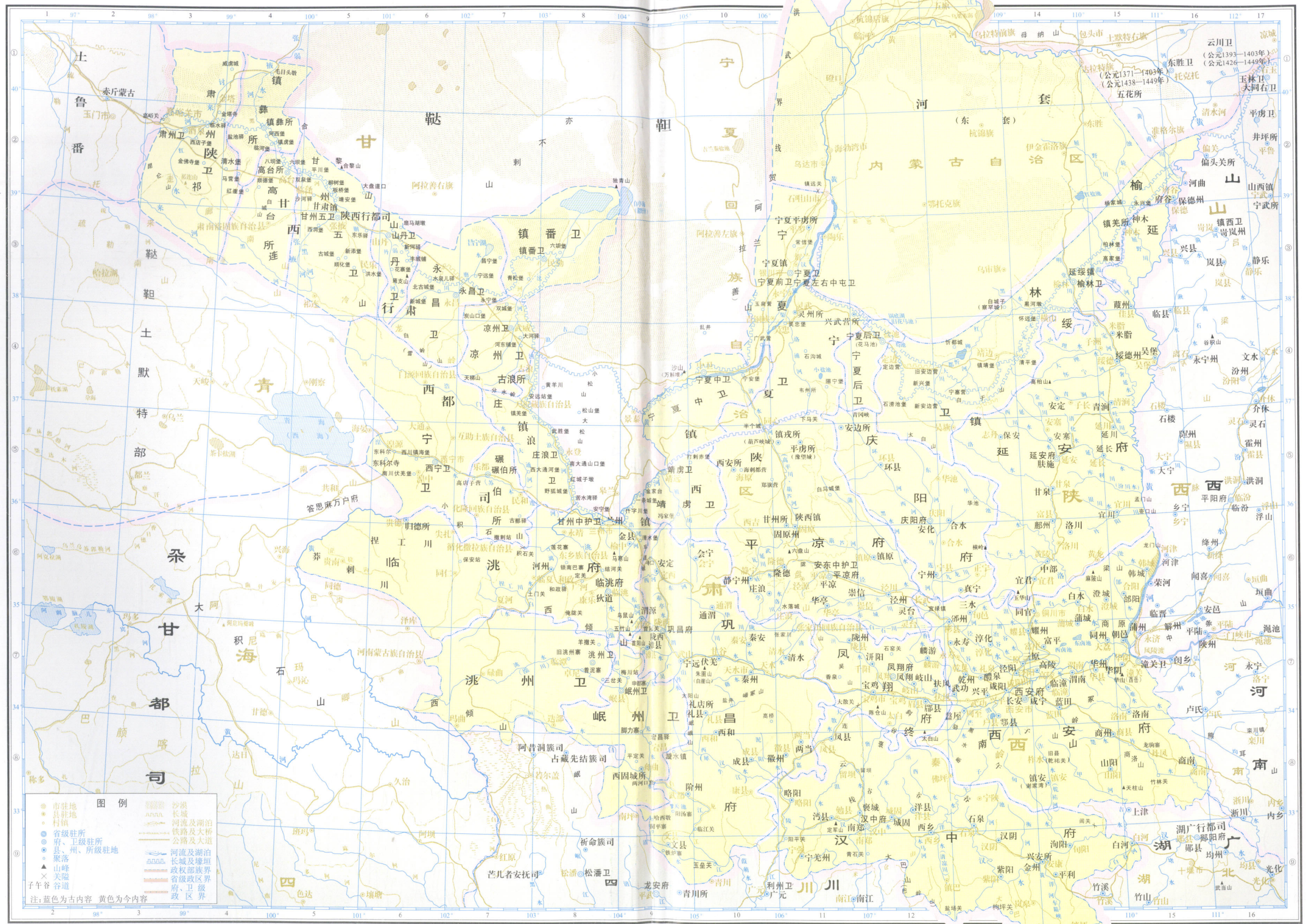
上

三秦出版社

陝西通志



明陝西疆域图





陕西省三原县图书馆藏明嘉靖《陝西通志》

前 言

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传统,就是由朝廷或地方官府出面组织编修地方志。现在校点的这部《陕西通志》,是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),由时任陕西巡抚赵廷瑞主修,陕西三原籍著名学者马理、高陵籍著名学者吕柟主持编纂的一部省级地方志书,共四十卷。不过,当时的“陕西”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划概念,其境域涵盖今天的陕西、甘肃、宁夏全部,以及青海、新疆和内蒙古的一些区域,涉及祖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。因此,这部《陕西通志》,实际上是今天的西北几省、区共同的地方志书。本书内容分星野、山川、封建、疆域、建置沿革、古迹、经籍、艺文、户口、田赋、物产、仙释、职官、水利、兵防、马政、风俗、灾祥、鉴戒及各类人物等,洋洋洒洒约一百九十万言。另有天象、地理、山脉、河流、城池、物产等附图二百余幅,号称“上下古今,括囊殆尽”,在历代各种陕西志书中久负盛名。由于这部《陕西通志》存世极少,在陕西省内目前仅发现一部,所以对其进行整理校点和出版,不仅具有很高的研究、参考价值,还具有保存、抢救古籍的作用。

陕西是中国一个非常特别的省份,它的历史悠久,涵盖了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、最鼎盛的历史时期。早在约一百万年前,在今陕西省省会西安附近,就出现了蓝田猿人活动的身影,这不但是中国

境内,而且也是整个亚洲早期的猿人,陕西也因此成为亚洲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。陕西又是中华民族及其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,被尊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炎、黄二帝及其领导的部落,都曾长期在陕西活动,由此肇始的中华文明,绵延五千年而直至今日,世界各地凡是出自这一血统渊源的人,都以“炎黄子孙”、“华夏苗裔”相称。在陕西,自战国时期就开始的纪念炎、黄二帝的活动世代延续,而从明代开始,中央政权派代表到陕西中部县(今黄陵县)桥山祭扫黄帝陵,已成为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,为的是昭示“正统”和彰显文化传承。近现代以来,祭祀轩辕黄帝更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、认同文化、期盼祖国统一强盛的一种特殊方式。这项持续了两千余年的传统,显示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,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周、秦以来,有十多个王朝曾建都于陕西,历时一千一百多年,其中的周、秦、汉、唐都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时代。据学者们考证,英文中“China”(中国)一词,就来自于“秦”。而煌煌汉、唐盛世,则更是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强国,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今天,占世界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人口属于汉族,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;汉语、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和文字,而外国关于中国的专门学科就叫汉学;至于亚洲东部曾经有过的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文化圈,则直称“汉文化圈”;海外华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被称为“唐人街”,他们称祖国为“唐山”,等等。这里的“汉”、“唐”两个概念,从时间上讲是源于历史上的汉、唐盛世,而从空间上讲则都是出自汉、唐的中心陕西。长安即今天的西安,是中国建都时间最长、最具代表性的古都,被列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。西安在世界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很强的感召力,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外国政要名流和普通民众,他们带着对伟大中华文明的浓厚兴趣,络绎不绝地来到西安参观访问。

陕西作为名扬四海的汉、唐精神的渊藪与中心,那奋发昂扬的

精神风貌,开放张扬的社会氛围,磅礴大气的历史文化,灿若繁星的杰出人才,都代表了古代中华文明的最高水平。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,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,长安也就长期成为儒家文化的中心。其他如佛教文化、道教文化、文学艺术、科技教育等,也都曾在陕西取得过辉煌的成就。

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,同时也是历史的主体。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以来,通过记述人物的活动来反映历史,是我国史志事业的一个传统。嘉靖《陕西通志》正是以浓墨重彩记述了自文明肇始以来直到明代中叶,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建功立业、大展宏图的英雄豪杰和文化巨人,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。毛泽东在他的千古绝唱《沁园春·雪》中,咏叹了历史上的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,而这四位中就有三位是在陕西大地上叱咤风云、奠都立国、创建宏图大业,并且最后都在陕西宽广浑厚的黄土地的怀抱中,找到了自己永远的归宿。陕西的帝王陵墓多达七十余座,高居全国之首,而陪葬墓和其他重要墓葬更不计其数。众多的历史人物,都把陕西这块热土作为自己青史留名的舞台。历代陕西人最可贵的思想品格,或者说支撑历代陕西人成就大业的精神脊梁,就是一种顽强拼搏、奋斗不息的精神。陕西杰出人物中少有那种风流倜傥、潇洒飘逸的“才子”,但多的是舍生忘死、置之绝地而不屈的血性男儿。从司马迁到苏武,从张骞到班超,从颜真卿到郭子仪,从寇准到韩世忠,从张横渠到李二曲,从冯从吾到王鼎,这种精神一脉相承。这一长长的名单中还应包括那些虽然籍贯不在陕西,但却主要是在陕西建功立业,最后安息在陕西的诸多人物,如霍去病、诸葛亮、魏徵、玄奘等。近现代以来,从鸦片战争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,到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从共产党人刘志丹、谢子长、魏野畴,到爱国民主人士杨虎城、杜斌丞,陕西有无数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人物,个个都是用血肉之躯去

搏击,因浩然正气而扬名。他们是陕西的光荣和骄傲,是顺应历史潮流、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。在他们身上,凝聚着陕西人代代相传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。我们要努力弘扬这种优良传统,并作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。

在中国历史上的周、秦、汉、唐时期,陕西可以说是中国“改革开放”的中心和策源地。作为政治、经济改革成功范例的“商鞅变法”,是秦由弱到强的转折点;而著名的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盛世”,也都是政治、经济改革的结果。这些改革都发生在陕西,并由之而推向全国。陕西也曾是引进外来人才最多、最成功的地方,战国时期以公孙(商)鞅、范雎、李斯为代表的“客卿”,一批批涌往秦国并大显身手,为秦最终统一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。陕西还曾经走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,古都长安作为“丝绸之路”的起点,作为世界一流强国汉、唐的首都,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和最重要的国际经济、文化交流中心。中华民族对外开放的先驱者张骞、班超都是陕西人,而鸠摩罗什、玄奘、义净、“开元三大士”、阿倍仲麻吕等一大批中外人物的著名旅程,也都是以长安为起点或终点。更令人深思的是,深处崇山峻岭之中,当时交通极端闭塞的陕南汉中,竟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国盛世——西汉王朝的发祥地,也是汉族、汉语、汉字、汉学等“汉”字的起源地。“丝绸之路”勇敢的开拓者张骞就是汉中城固人,至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,重视并大胆启用人才的“登坛拜将”故事,也都发生在这个山间盆地之中。

唐末大乱以后,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迁,陕西也告别了昔日的辉煌,其历史地位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它虽然在中国西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中仍处于重要地位,但毕竟不再是国都之所在,甚至沦为腥风血雨的战场,各种政治、军事力量在这里角逐,战火断断续续燃烧了数百年之久,使陕西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。到纂修这部《陕西通志》时的明代中

叶,陕西的各方面都已今非昔比,这一巨大变化过程在书中清楚地反映出来。撇开战乱频仍的五代不论,自“积贫积弱”的宋代以来,随着边防形势的需要,陕西修筑的各种“堡”、“砦”大量增加,尤其明代依据建国前定下的“高筑墙、广积粮”的基本国策,陕西各地更是出现了要塞化的趋势,到处高墙林立、密不透风,陕北的地名如靖边、定边、安边、吴堡、安塞、保安、安定、吴旗等,一看就知道与军事有关,而明代仅榆林地区修建的长城即“大边”、“二边”,加起来就有上千公里长。本书有关明代这些大大小小的“墙”,以及他们修建过程的资料是非常详尽的,显然这是编纂者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。由此而反映出的是,由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形势的变化,当时的统治阶级早已丧失了汉、唐时期的大气和雄风,从思想观念上趋向封闭和保守。那种很强的阻隔性带来的“自给自足、各守一方”的封闭意识,以及“小富即安、不思进取”,“万事不思温饱外”的保守观念,再加上追忆辉煌历史所产生的“皇天后土之民”的失落感,这些都深深注入陕西人的思想深处,这也许是造成陕西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。就这样,勇于改革与故步自封,大胆开放与保守封闭这些截然相反、尖锐对立的情况,都发生在陕西这同一块土地上,又同记载在一部志书中。伏案细读,发现从这部志书中我们可以汲取的内涵非常丰富,这是由其所承载的巨大容量,以及所体现出的由盛到衰的强烈反差所决定的,所以本书给人的启迪的确是十分深刻。研究历史发展的过程,总结历史的经验,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,是历史研究的目的,也是这部志书留给我们的宝贵借鉴之一。

嘉靖《陕西通志》有着丰富的资料性,它翔实地记载了陕西各地(实际就是西北各地)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及变迁状况,各级官府的结构和人员设置,军事要地的设防,交通路线的布局,以及风俗、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,这使我们对陕西的历史发展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。如书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大量水利

工程,这表明在以灌溉农业为主的陕西,水一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,因之官府和学者都给予高度的重视。这些水利工程,从战国时的关中郑国渠开始,到楚汉之际的汉中山河堰,以及汉代的白渠、成国渠、六辅渠等,很长时期都还在发挥着作用,并且同今天陕西的一些重要水利设施有着直接的接续关系,所以在今天也就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。书中记载,明代中叶时陕西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经很大,从官府所征收的工商税来说,有的县一年有近二百两白银,而有的县一年却不过数两,甚至只有区区三钱一分,差距达数百倍。又如,当时陕西的人口第一大县是富平县,经济也比较发达,这与后来的情况就有所不同,各地沉浮起落的原因及过程值得我们深入探究。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其他方面的许多情况,如当时官府规定,各地缴纳的赋税中很大一部分是实物税,然而这些实物税虽然数量不等,品种方面却是大同小异——粮食作物几乎一样,还有羊只、羊皮,只是药材品种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。这表明当时各地的自然条件相去并不算远,所以才会有从陕南直到陕北大致相仿的实物税。但是,既然自然条件的差别有限,那为什么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会有很大的差距呢?可以看出,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各地官府的政策和施政水平。在人治重于法治的封建社会,地方官吏的所谓德政、善政,都是因人而出,因时而现,并因人去而政息。社会的安危治乱往往系于执政者的个人品质和主观意志,这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治乱交替的重要原因,也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和发展规律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嘉靖《陕西通志》还用了很多笔墨去记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。这些,除了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外,也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借鉴。在这部《陕西通志》中,全文引录了长达数千字的蓝田《吕氏乡约》,这是保存至今最完整的宋代乡规民约之一。《乡约》详细规定了长幼尊卑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,在日常起居、衣食住行、生老病葬以及各种不同场合下,应

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,体现出当时陕西民间崇尚的伦理道德标准。以这种伦理道德标准为指引和约束,陕西人多以诗书耕读传家,以道德操守自励,重视文化教育,努力培养人才,这也从一个侧面,反映了历史上陕西淳朴敦厚的民风习俗和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。

唐代以前,陕西人习惯以“中央”的眼光看问题,有着很强的宏观意识,这是由陕西特定的“中央”与“京畿”区位优势所决定的;到了编纂这部《陕西通志》的明代中叶,又不得不改用地区性的视角来观察、来思考,所以对问题的认识更趋向于微观与具体。我们应当将历史上留下来的“中央视角”、“大区域视角”,和今天从一个省的角度看问题的视角联系起来,将宏观与微观的考察结合起来,力求使我们对陕西的认识客观、全面、深入。我们坚信,只要我们对陕西的过去作出正确的总结与扬弃,对陕西的今天有着深刻的了解与认识,对陕西的未来能够科学地预见和把握,不断解放思想,与时俱进,坚持改革开放,坚信事在人为,处在中国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地位的陕西,就一定能够重振雄风,再现辉煌。

中国地方志的一大特点,就是具有连续性,这是由中华文化绵延不绝、从未中断的特征所决定的。每一部志书都承接着前一部的记述,从而像接力赛一样薪火相传。即使是本书这样贯通古今的“通志”,也大量借鉴或使用了前代志书、史书和其他各类文献。尽管不同的方志编纂水平有高下之别,但其承前启后的特征却一脉相承。我们看到的这部《陕西通志》所记述的明代中叶陕西的各方面情况,既是当时陕西发展的一个比较真实的横断面,也是千百年来整个陕西历史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,因此,这部志书也可以视为一部厚重的陕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。当然,作为封建时代编纂的一部地方志书,其中也不免包含着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,这就要求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,“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”,使其发挥应有的“资治、教育、存史”的作用。

在实施“西部大开发”伟大战略的今天,这部涵盖西北地区广大地域的《陕西通志》,将会给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各省、区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参考。对其进行深入、细致的整理校点,让更多的读者更方便地阅读和使用,将会使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进一步释放出来,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不难预料,这部《陕西通志》的整理校点并刊印出版,除了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外,也应当会引起更多的非专业人士,特别是各方面的决策者以及关心“西部大开发”伟大事业的人们的关注。有利于他们汲取和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,把陕西的事情办得更加切合实际,更加富有特色,更加具有实效。这也是整理校点这部《陕西通志》的现实意义之所在。

校点说明

一、本次校点整理的四十卷本《陕西通志》(以下简称“本志”),是明代陕西巡抚赵廷瑞修,陕西三原籍著名学者马理、高陵籍著名学者吕柟主持编纂,于嘉靖二十一年(1542)编纂完成。该志现存陕西省三原县图书馆。

二、本次校点明嘉靖《陕西通志》,依据包括《明史》在内的明以前历代正史以及本志内容所涉及的各类文献典籍资料。历代正史以中华书局校点本为主要依据,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乾隆武英殿本;其他各类文献典籍则在本志《校点参考书目》中注明版本来源。

三、本志为纲目体,直排本。本次校点,改为横排,对原书卷、目次序及记述顺序未做变动,但根据横排方式及内容需要,对原书版式做了必要调整,并根据内容层次加以分段。

四、原书所用繁体字改为规范简化字。人名、地名中繁体字凡属专用字者不改;属通用字者改为规范简化字。除卷三十二《石鼓文》一篇外,古字、异体字均径改为规范简化字;通假字一般不改,仍依其旧。

五、标点符号以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3 日发布,自 199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《标点符号用法》为依据(GB/T15834—

1995),但不使用破折号、省略号、着重号、连接号、专名号等标点符号。

六、对发现的原志中史实错误或疑误及脱讹倒衍之处,予以校勘。凡改动原志的地方,用不同字号和方、圆括号表示:圆括号()内表示删去,方括号[]内表示改正或增补,并出校勘记。

七、对疑有脱讹倒衍,但无确凿资料证实者,不做改动,但出校勘记说明。对明显的误刻之处径改,不出校勘记。

八、古人引用文献典籍,每有省改。凡仅文字表述有出入,但文意通畅且无歧义者,一般尽量保持本志原貌,不据他书改动本志;凡文意两通而含义不同,或文意、文字表述均有出入者,出校勘记说明;凡本志不误,他书误者,不出校勘记。

九、本志引用他书文字,凡直引原文者,引文一般加标引号;凡属概述原文大意,而非直引原文者,则不加引号。

十、避讳改字不做纠正,个别影响理解文意的避讳字,出校勘记说明。

十一、本志正文以标宋体、黑体、宋体等字体及不同字号表述,以显示层次上的区别;本志作者穿插于志书正文中的议论性、解释性文字,以楷体字表述;作者在志书正文之外的整段议论性文字表述,同志书正文。

十二、本志附图,均依原图重新清绘。凡图中个别显系误刻之错别字径改外,不做其他改动。图中文字,不加标点,不改为简化字。但对原图漏刻及舛误之处,出校勘记说明之。并根据排版需要,对附图在志中的随文位置做了适当调整。

十三、凡多处校勘所据资料出处相同者,尽量归并为一条校勘记,以“以上据《××××》校改”方式出校。

十四、校勘之处以数码①、②、③等在需要出校的字、词、句后右上角标示,校勘记置于本页末。

十五、对本志作者观点、见解不能苟同之处,不出校纠驳。

陕西通志序

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
右佥都御史奉敕巡抚陕西

澶渊 赵廷瑞撰

嘉靖壬寅十月，陕西布政司刻通志，冬杪告成。予览之终篇，叹曰：“斯其为陕西通志也已。”按旧志三十卷，刻于成化乙未。实钧阳马公巡抚时，属按察副使临川伍天锡氏编辑之也。天锡督学此邦最久，其志颇号详雅。顾今阅七十年，板佚其半，即秦城巨家，亦罕有其书矣。予至关中之再逾年，岁直辛丑，蚤春行县过三原，因与溪田马先生语及是志，僭谓时可嗣修。先生曰：“友人吕泾野，旧历载言之司，必约之共事。”予至高陵，请于泾野，可之。归乃谋之侍御颍川张君暨三司长僚，咸曰：“惟是得马、吕二公之笔，志成将不徒足征尔矣。”乃会遣学官往致丁宁。二公于是卜竹林祠为馆，各率从游之士，载所藏群书，肇纂述之事。首标义例，拟议攸同。乃分类限域，交尽所长。居数月，泾野以忧辞，寻遘疾，竟伤不起。是志也，盖多出溪田先生之手云。

志分四纲，衍之以二十八目，总四十卷。其论叙多做敕之词。其载事星躔河岳，上下古今，括囊殆尽。其旌善虽微必书，否则虽有爱而必捐。其考索之精，虽史传宿讹，亦多是正。艺文无繁富之

嫌,政教貽官师之则。机要既审,体裁亦异。譬之萃众腋而成珍裘,合群材以构华屋。斧凿无迹,剪制自如。方诸古史,抑曷多让焉。

予每睹近代之为志者,往往征求异闻,采撷群事,自谓能成一家之言。然不失之烦芜,则失之陋略。甚者私徇笔端,缘情载削,文词苟诤,信后为艰。刊布未几,辄受嗤于人,人则亦奚取于志也。维兹通志,悉于是乎反矣。然予所独喜者,谓足以完既废之典,以诏方来。继自今生于斯、宦于斯者,取而观之,全秦之故,毕陈于目前。其于民俗政体之助,岂其微乎!遂序诸首简。

陕西通志序

賜同进士出身巡按陕西
文林郎山东道监察御史

郝 郛 周 南 撰

古者国必有史以纪时事。今之志，固古史之遗也，而奚容于弗辑乎哉？弗辑则逸，逸则亡，而后将无所于考。陕故有志，粤自钧阳马端肃公校辑以来，寥寥乎六十余载，未有能绍之者。嘉靖丙申，余被命行役至陕。始而由潼华，履长安，登汉唐故墟，曰是可以观政也已矣。讯之于士，盖十不能举一焉。既而历丰镐，渡河渭，览宗周遗迹，曰是可以观化也已矣。征之于民，盖百不能举一焉。已乃探龙庭，窥瀚海，访古名将余烈，曰安内攘外，舍是吾不欲观之矣。求之于野，盖万不能举一焉。乃进诸掌故者，夷考其志，漫漶阙略，无所取征，犹之夫士与民与野焉尔。叹曰：“嗟乎！陕固天下之名藩也，而忍使其事堙没弗传，一至是乎！”乃今省方，幸从事抚台洪洋赵公之后。公尝校讎天禄，识达大体。一时德业闻望，有光端肃。因默念绍端肃坠绪，以垂不朽，非公而谁。未几，公果出所校泾野、溪田通志，总若干卷示余，且告之曰：“前侍御双溪张子秀而惠文，吾尝以是谋之张子。张子曰：‘章往察来，匪志弗经，惟公其熟图之！’盖于是恒恐恐焉，蚤夜以思，惟大猷之不足经，以陨若耿光是惧。今幸竣事，惟吾子其一言以祝简册！”